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秘鲁抗议者“第三次占领利马”	1
乌干达服装行业工会活动近况	4
西班牙工人共产党评 2023 年大选	11
爱尔兰康诺利青年运动扰乱防务咨询会议	14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新阶段	18
近期剪报	24

2023 年第 19 期

2023 年 9 月 21 日

重要声明

本刊指定发布渠道为邮件推送和网站 **IRN.red**，目前未参与任何社交平台账号的运营与活动。

允许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传播本刊内容，无需授权。转载时建议注明出处：**IRN.red**

订阅方式

以下三种方式，选择一种即可：

1.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 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 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 irn3000@outlook.com

秘鲁抗议者“第三次占领利马”



来源：英国共产党“晨星报”网站

日期：2023年7月21日

题图：反政府抗议者与警察在利马市中心发生冲突。

链接：<https://morningstaronline.co.uk/article/w/third-takeover-of-lima-sees-democracy-protesters-sweep-through-peru-capital>

民主抗议者在过去三天里占领了秘鲁首都的部分地区，这次抗议被称为“第三次占领利马”。

这是今年1月以来首都的第三次游行，因此得名。游行是由工会、原住民权利组织、农民和妇女团体组织的。

这场游行于7月19日星期三席卷利马。直到7月20日星期四结束时，游行者们仍控制着伊拉瓦桥（Ilava Bridge）和部分关键街道。各民主组织的联合团体——全国斗争统一协调会（National Unitary Co-ordinator of

Struggle) 表示，它将于 7 月 22 日星期六在利马举行进一步的示威活动。

人群高呼着“我们决不接受篡位者迪娜！”“杀人犯迪娜！”“团结的人民永远不被击溃！”等口号。迪娜指的是迪娜·博卢阿特 (Dina Boluarte)，去年 12 月国会推翻民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佩德罗·卡斯蒂略 (Pedro Castillo) 时，她作为时任副总统被任命为总统。

新秘鲁党 (New Peru) 的妇女部门表示自己参与了此次游行：“我们走上街头，抗议迪娜·博卢阿特及其犯罪联盟的独裁统治，抗议国会，并纪念我们被谋杀的兄弟们。”

针对卡斯蒂略的政变发生以来，已有数十位示威者被枪杀，而卡斯蒂略本人仍然被囚禁在监狱。秘鲁人权办公室 (Ombudsman) 表示，已经在全市部署了观察员以监控警察的行为，以保障抗议者和平抗议的权利。

然而，秘鲁全国人权协调专员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ordinator) 表示，该国的便衣警察仍在对报道抗议活动的记者和反对逮捕的律师进行“骚扰”。

这场运动的要求包括：立即释放卡斯蒂略、博卢阿特辞职、现任国会解散。

秘鲁女权主义者露西娅·阿尔维特斯 (Lucia Alvites) 告诉社会主义网站《人民快讯》(People's Dispatch)^[1],

^[1] 《人民快讯》对露西亚的访谈 <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3/07/18/peruvians-to-hit-the-streets-for-third-takeover-of-lima/>——译注

秘鲁的政变联盟由极右翼、军方和警方长官组成。

卡斯蒂略本人在 2021 年的选举中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这在秘鲁的精英阶层中引发了恐慌。他在大选中击败了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之女藤森庆子（Keiko Fujimori）。20 世纪 90 年代，阿尔韦托主持了针对原住民妇女的大规模绝育计划，这使得原住民成了抵抗针对卡斯蒂略的政变的支柱；2019 年至 2020 年邻国玻利维亚的独裁统治时期也是如此。^[2]

秘鲁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谋划也至关重要。美国赞助的利马集团（Lima Group）就是在秘鲁开会宣布成立的，该集团的目标是在 2017 年颠覆委内瑞拉政权。美国在秘鲁共有 8 个军事基地。自上个月以来，华盛顿方面已经应政变政府的要求向秘鲁派遣了更多的军队。

^[2] 2019 年，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莫拉莱斯总统被迫辞职并流亡国外，右翼的珍妮娜·阿涅斯总统上台，并残酷镇压了反对政变的群众抗议。2020 年，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在大选中胜出，重新上台。——译注

乌干达服装行业工会活动近况



来源：印度“人民快讯”网站

日期：2023年5月31日

链接：<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3/05/31/amid-threats-and-exploitation-ugandan-union-strives-to-organize-garment-sector/>

5月初，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Uganda Textiles, Garments, Leather,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 (UTGLAWU)）的五名成员在首都坎帕拉（Kampala）被警方逮捕。

他们手持海报和写有“支付工人工资，尊重劳工权利”的横幅，来到一家销售阿迪达斯这个跨国服装公司产品的商店，并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是反对服装供应链中（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对工资的盗窃和对工人的剥削的全球

运动的一部分。

全球 285 个工会和劳工权益组织参与了这场运动，它们指责阿迪达斯拖欠工人工资。仅在柬埔寨，就有 8 家阿迪达斯供应厂商拖欠工人工资达 1170 万美元。

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的这次声援行动，以工会成员前往坎帕拉的商店递交请愿书作为开始。然而，他们遭到了逮捕并被带到了中央警察局。警察企图将他们的行动定性为违反《公共秩序管理法》（Public Order Management Act (POMA)）的非法抗议和非法侵入，致使他们被拘留和审讯了数小时。

对这次声援世界另一地区服装工人的简单行动的报复表明，在乌干达，尤其是在纺织和服装行业，工会领导人饱受着恐吓。这个行业因工作不稳定和将投资置于有尊严的劳动条件之上而臭名昭著。就乌干达服装和纺织行业工人组织起来的情况，以及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对乌干达劳工权利的影响，《人民快讯》（Peoples Dispatch）采访了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的成员艾琳（Irene）。

虽然该工会 1979 年才正式注册，但其斗争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的殖民政府在尼罗河沿岸建立了尼安萨纺织工业公司（Nyanza Textile Industries）。艾琳接着解释说，该工厂的工人曾试图自己成立一个协会来进行集体谈判。虽然当时没有成功，但经过多年的发展，这

个协会最终发展成为了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

该工会目前大约有 7000 名成员，它动员了纺织和服装工厂的工人，并一直在努力扩大其阵地，以便让在中小企业（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等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工人加入进来。

结构调整计划的影响

就像全球南方的其他地区一样，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和随之而来的自由化、私有化对乌干达工人产生了严重影响，导致了大量的失业、经济非正规化和工厂被出售，所有这些都对工会的力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此外，新冠病毒疫情也是一个打击。

根据乌干达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21 年，非正规部门对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51%。根据乌干达财政部发布的《2021 年贫困状况报告》，该国估计有 79% 的企业属于非正规部门，全国有 75% 的人口在非正规部门工作。

艾琳表示，众所周知，非正规部门的贫困率很高，同时福利率较低，整体不稳定程度很高。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在包括服装和纺织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工人开始在没有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被解雇，并且在没有获得任何解雇补偿金的情况下被遣送回家。

她同时还补充说，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

人工会还在努力接触居家生产（从事裁缝、缝纫和编织活动）的工人。根据世界银行 2013 年的一份报告，非农业非正规部门 86%的工作岗位都是以家庭为单位（household-based）的。工会也一直在动员皮革、塑料和泡沫行业的工人。

工会还一直筹备着让轧棉厂的工人加入进来。随着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原有的轧棉合作社已经倒闭了。

在进工厂做工被认为是一个人能获得的“最好工作”的背景下，在一个有 1800 万人（近 40%的人口）在多维贫困^[1]中挣扎的国家里，工厂车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剥削场所。

艾琳详细讲述了工人面临的性别化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欠薪、医疗保险缺乏、工伤赔偿缺乏，以及工时过长甚至没空上厕所等问题。虽然结社自由法在纸面上是存在的，但据报道，工人往往会因为加入工会而受到伤害。

恶劣的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往往也是不安全的，“一些工人只戴一只手套，而且必须使用一整年”，而另一些工人则经常被迫自费购买劳保装备。

虽然只有约 18%的劳动人口被纳入国家社会保障基金

^[1] 人的贫困不仅仅指收入贫困，还应该包括诸如可接入基础设施所提供的服务（如自来水、道路、卫生设施）、获得的社会福利及保障等指标，以及对这些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译注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 的覆盖范围，但乌干达纺织、服装、皮革和联合工人工会还是遇到过雇主“以不同方式”缴纳社会保障费的情况——雇主没有汇出这笔款项，而是“将其留作专项基金，以备工厂倒闭时自保”。

同时，工会表示工人每天的收入还不到一美元。几十年来，乌干达在实施有效的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一直无所作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的指导，乌干达议会于 2019 年通过了《最低工资法案》。然而，约韦里·穆塞韦尼 (Yoweri Museveni) 总统最终拒绝签署该法案。

艾琳还说：“工人们无法负担基本生活费用。例如，大多数工人都住在简陋的住房里，而且大多是很远的贫民窟，他们不得不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工作地点。在经济困难时期，工人们每天吃不起一顿像样的饭，甚至连医疗费都负担不起。”

工会还指出，大多数工厂不给工人提供身份证明，这些工人基本上是合同制的，只雇用一段时间就被解雇。

工会活动面临的挑战

由于一些工厂戒备森严，无法接触工人仍然是工会组织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甚至连了解这些违规行为都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工人们自己也担心会遭到报复……大多数情况下，当工会招募工人并向工作场所 (管理层) 提交意见时，工

人们就会被解雇。”

艾琳说：“一些服装生产线对我们来说是隔绝的，所以即使我们能够其他生产线组织工会，服装行业也仍然是一个挑战。”在乌干达的服装企业中，有些生产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成衣，有些向非洲其他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出口产品，还有一些完全专注于生产棉绒。

乌干达的纺织业仅限于几种基本的服装，而该国已成为西方输出二手服装的市场，这些服装通常更便宜，且被认为更“时髦”或“时尚”——“这也扼杀了本国的服装业”。

进出口失衡，或者说广义上的贸易不平衡，在乌干达根据《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与美国签订的协议中也有明确体现。虽然协议中承诺的项目将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以优惠条件向美国出口成品，但乌干达向美国出口的一些主要产品仍然是咖啡、茶叶和香料。

不仅如此，从“阿戈阿女孩”（AGOA girls）^[2]的案例也能明显看出，这里的工作环境是极具剥削性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青年失业问题持续存在的国家，上述情况导致许多人出国寻找工作，其他人则转向中小企业，包括电器店、杂货店和美容院等等。

^[2] 指 2004 年在乌干达某外资工厂发起罢工的 200 余名年轻女工，她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获得加入工会的权利。——译注

然而，艾琳指出：“归根结底，这些中小企业也面临着高额税收和租金的挑战。以年轻人和妇女（包括单身母亲）的生意为主的小企业正在倒闭，她们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迫返乡。”

“通货膨胀正在影响许多人的生活，尤其是工人，他们甚至无法按时领到本就少得可怜的工资。在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封锁期间，高油价导致运输成本几乎翻了一番。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两点一线的通勤也成了一大挑战。他们目前仍然难以负担这些费用”。

最后，艾琳总结道：“创造就业机会而不真正考虑劳动条件……这是对人权的侵犯。现在是政府清醒地认识劳工问题的时候了，别在为投资者创造毫无尊严的工作岗位而喝彩了。”

西班牙工人共产党评 2023 年大选



来源：希腊“保卫共产主义”网站

日期：2023 年 7 月 25 日

链接：<http://www.idcommunism.com/2023/07/spanish-elections-2023-pcte-communists-emerge-strengthened-under-negative-political-conditions.html>

西班牙 7 月 23 日的选举结果出炉，执政的社会民主派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或右翼反对党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胜利，双方均未能得到足够席位来组成政府。这次选举决定着 350 个议会席位的归属，投票率为 70%，注册选民共计 3750 万人。

右翼的人民党（PP）以 136 个席位赢得了选举，较 2019 年大选增加了 47 个席位。而由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首相率领的社会民主派的工人社会党则赢得了 122 个席位。

另一方面，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的呼声党（VOX）损失重大，从原来的 53 个席位下降到了 33 个席位。较小的社会民主派联盟——“汇总”运动（SUMAR）赢得了 31 个席位。

西班牙工人共产党得到加强

西班牙工人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Workers of Spain (PCTE)）政治条件艰难、力量相对薄弱，媒体报道稀少，然而其选举影响力仍有提升：众议院选举得票从 2019 年的 13029 票增加到 2023 年的 18218 票；参议院选举得票从 2019 年的 22767 票增加到 2023 年的 64644 票。^[1]

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工人共产党在今年 5 月的地区和市政选举中也增强了其选举实力。

西班牙工人共产党政治局在一份关于选举结果的声明中强调：“如果选举只是在工人社会党及其支持者‘汇总’运动，与人民党及其支持者呼声党之间选择，那么这样的选举只是在选择西班牙资本主义的不同管理形式，只是在选择西班牙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的主要代表已经看到，

^[1] 选票数字根据 wikipedia 修正。——译注

在上一届政府执政下，他们的利润得到了大幅增长，而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则显著恶化了……”

西班牙工人共产党在声明中还强调：“尽管人民党胜利了，但它和呼声党加在一起并未占据绝对多数。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几个月后重新选举，除非那些主张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力量支持佩德罗·桑切斯和‘汇总’运动的新社会民主主义联合政府上台。如果社会民主主义的联盟重新上台，那么在下一届任期内对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攻击将沿着老路走，也就是危机在疫情催化下爆发后所走上的那条路。政府将实行有利于企业雇主的灵活工作措施，并以补助金、债券、直接或间接援助的名义将劳动者收入大量地转变为资本收入，来维护企业的利润；政府还将把这些政策包装为工人和人民的新权利。在重新选举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大多数将被迫屈从于旨在巩固两个资本主义集团的主要党派的野蛮的竞选运动”

对于该党自己的成绩，西班牙工人共产党说：“我党的成绩虽然还很有限，但有增长的趋势，尽管我们在三分之一的选区并未提出候选人。选举结果表明，我们应当继续推进真正阶级导向的、反对资本主义共识的反对派立场。要让这一反对派立场成为可能，必须有如下条件：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得到加强，他们的传统斗争工具得到恢复，他们在清晰的引导下与资本主义决裂、与支持资本主义的人决裂、与那些假装融入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反动立场决裂。”

爱尔兰康诺利青年运动扰乱防务咨询会议



来源：印度“人民快讯”网站

日期：2023年6月24日

题图：康诺利青年运动的成员在防务咨询论坛会场抗议。

链接：<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3/06/24/anti-war-groups-in-ireland-disrupt-security-conference-at-cork-university/>

爱尔兰政府的首届防务咨询会议在科克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Cork）开幕，讨论军事化和参与军事联盟的问题。该会议被爱尔兰反战团体扰乱。6月22日，康诺利青年运动（Connolly Youth Movement (CYM)）的活动家们进入了“国际防务政策咨询论坛”（Consultative Forum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的会议现场，打出反战口号并举起红色横幅，横幅上写着“北约的战争

——数百万人的死亡”。

属于自由派-保守派执政联盟的共和党（Fianna Fail）成员米歇尔·马丁（Micheál Martin）是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本来要在6月22日星期四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但是被反战抗议者打断了。抗议者们被强行送出会议门外。

尽管发生了抗议活动，但咨询论坛还是继续进行。该论坛6月23日在高威（Galway）举行了会议，并计划在26日至27日召开更多会议。按政府的构想，“国际防务政策咨询论坛”将提高人们对爱尔兰外交、安全、国防政策的理解，并促进讨论。

然而反战人士和进步团体对这些咨询会议背后的目的表示担忧。参与科克抗议活动的组织之一——科克中立联盟（Cork Neutrality League）说：“这个论坛不公正地倾向于加强军事化的支持者。”

马丁在科克会议的讲话中说，人们不应对爱尔兰参与“永久结构性合作”项目大惊小怪。该项目是一个广受批评的欧盟安全和防务项目。

6月22日星期四，康诺利青年运动科克委员会声明说，爱尔兰青年反对该国参与任何军事联盟，不管是北约还是“永久结构性合作”。

声明还说：“在科克举办的一大堆亲北约活动是统一党-共和党-绿党（Fine Gael-Fianna Fail-Greens）政府策划的。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人为地制造出对他们破坏爱尔兰

中立的战略的赞同。在危机时期，政府着重于加强军事化，而同时成千上万人却无家可归，贫困率也在上升。”

预计还会出现更多抗议和示威行动：爱尔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reland）也已经发出号召，呼吁大家 6 月 26 日前往都柏林的咨询论坛抗议。

在爱尔兰，一直有反对爱尔兰参与“永久结构性合作”的运动。爱尔兰左翼团体认为，自从爱尔兰 2017 年加入“永久结构性合作”以来，统一党、共和党等传统党派就在损害爱尔兰长期重视的中立政策。

此外，在 2022 年 9 月，爱尔兰还通过欧洲和平基金（European Peace Facility (EPF)），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 5500 万欧元（约合 5989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专门用于非致命的军事援助）。

6 月 22 日星期四，新芬党（Sinn Féin）外交事务发言人马特·卡提（Matt Carty）在科克的咨询论坛上说：“爱尔兰应当着力结束冲突，而不是参与冲突。”作为列席个人，他发表讲话说：“爱尔兰的中立政策对国家起了很好的作用。”

爱尔兰不断与欧盟、美国、北约拉近距离，这一直是反战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激烈反对的重点。例如，自从 2001 年爱尔兰政府批准美国、北约出于军事目的使用香农（Shannon）机场以来，活动家们就一直定期组织抗议。

乌克兰的战争、欧盟针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能源巨

头的投机行为，导致了爱尔兰等许多欧洲国家发生生活开销危机。几年来，康诺利青年运动等进步团体一直在“掀掉屋顶”（Raise the Roof）的口号下抗议爱尔兰各城市飞涨的住房价格危机。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新阶段

《乌克兰战争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连载



编者按：《乌克兰战争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The Ukraine War and the Open Crisis of the Imperialist World System）由德国马列主义党（MLPD）领导人斯史蒂芬·恩格尔、加比·费希特纳、莫妮卡·加特纳-恩格尔撰写。本文发表于2022年7月，全文共分八章。本刊正连载此文，本期刊登的是第七章“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新阶段”。

来源：德国马列主义党网站

链接：<https://www.mlpd.de/english/2022/the-ukraine-war-and-the-open-crisis-of-the-imperialist-world-system>

202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帝国主义大国和集团之间的军事对抗直接地升级了。它结束了70多年的帝国主义和平。在此之前，当然也有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入侵或代理人战争，但不管它们有多么残暴，对人类的生命、生产场所和生活环境产生了多少破坏，它们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的、相对较小的。

伴随着乌克兰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威胁，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框架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进入了加速动荡的新阶段。这为世界性的革命危机奠定了基础。由此，帝国主义危机四伏的性质获得了新的特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一切主要矛盾都在迅速激化。

公开的世界危机

随着乌克兰冲突的发生，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生态和军事危机爆发了。这种新开始的形势陡然地改变了革命阶级斗争的任务。

1、在政治上，原有的多极结构遭到普遍而不受控制的破坏，使公开的世界危机得以显现。这从根本上质疑了现有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及其体制。苦心拟定的国际法条款、人权条款和国际间有效的裁军条约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联合国、北约或欧盟等国际组织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公开的危机，这是各国国家利益之间出现对立的结果。例如，在2022年3月24日，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53个拒绝批准联合国大会关于立即停止俄罗斯对乌克兰敌对行动的决

议。在所有国家中，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的头号战争贩子，它提出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民主联盟”，作为瘫痪的联合国的替代方案。

2、经济上，在 2018 年爆发并不断加深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出现了国际生产重组的公开危机。

3、开放的世界贸易遭到质疑。贸易战之前就已经爆发了。随着对俄罗斯的制裁，贸易战升级为一场世界经济战争，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

4、生态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所谓的“安全政策”被明确地置于迄今已实行的一切环境政策之上。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这种取向极大地加速了向全球环境灾难过渡的方方面面。

5、世界军事危机使得国际外交及其此前关于和平主义与帝国主义和平的设想破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在或多或少地公开积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6、这与许多国家发生的大规模右转有关：从国家机器的法西斯化直到向法西斯主义转变。

7、几十年来第一次，俄罗斯和美国/北约都在积极准备核战争，故意将其纳入讨论，并冷酷地接受这种危险。

8、向着积极准备世界大战的转变，也加剧了德国的社会矛盾，包括德国金融资本内部以及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

内部的矛盾。群众对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信任危机也在加剧。

9、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正在加剧，首先是以前被认为无可争议的基本构想的公开危机：例如，所谓“以和平为目标的外交政策”、“通过贸易来改变”，或者帝国主义环保主义的众多变体。德国政府的新构想，比如“社会-生态转型”的承诺，在被发明出来不久之后就化作了泡影。

10、现存的各种危机相互促进：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结构性危机、债务危机、向全球环境灾难的加速转变、资产阶级难民政策的危机和资产阶级家庭制度的危机、越来越多国家的饥饿危机、急剧增长的通货膨胀，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正在世界各国合并成一种走向普遍社会危机的国际趋势。

11、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基本矛盾，迫切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解决。这是向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过渡的客观基础。

列宁曾这样描述革命形势的一般特征：

“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
(1) 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 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

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 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1]

由非革命形势阶段向剧烈革命形势阶段的转变，首先主要是由客观因素引起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统一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由于缓和危机的措施和对公众舆论的操纵，主客观因素的统一是作为一个或多或少地滞后了的，先是政治的、后是革命的发酵过程而发展的。革命的世界危机的展开，关键取决于国际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必须具备在国际层面协调斗争并使斗争革命化、从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积极抵抗的能力。而对整个社会有影响的各国马列主义政党的出现和加强，是这一进程的目标指向性、深刻性和稳定性的决定因素。

但是，革命的警惕性也需要我们考虑到反动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在觉悟尚低的群众中发展的可能性。在世界观领域，反动的反共主义和面向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矛盾的加强，在这一点上将会表现得尤为明显。

没有人能预见发生在乌克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具体走向。但是，交战各方故意使战争升级以及战争本身的动态，都是可能使军事冲突最终过渡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素。

^[1]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6/034.htm> ——译注

克劳塞维茨就曾揭示过这背后的法则：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交战的每一方都迫使对方不得不像自己那样动用暴力，由此便产生了相互作用，从理论上讲，这种相互作用一定会导致极端。”

在这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加速动荡的阶段，原则上只有两种选择：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这种估计遵循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批评了（资产阶级）在操纵舆论方面对这一发展的严重性的不恰当的贬低。这个阶段也有可能因为群众的抵抗，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或因为交战一方的屈服而停止。然而即使如此，也不会简单地回到乌克兰战争之前的时代了。而只要这个阶段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战略和策略就必须针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危险，在世界范围内加速从非革命形势阶段向革命形势阶段的过渡。各国帝国主义政府积极准备世界大战，加速破坏环境，把危机和战争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将日益使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发生公开的矛盾，并激起他们的斗争。

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公开危机，使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化。

利比亚洪灾已致一万多人死亡

世界气象组织称灾难原本可以避免

【美联社利比亚德尔纳9月14日电】利比亚红新月会14日说,在暴雨导致两座大坝决堤并加剧严重的洪水后,随着搜索工作的持续,利比亚沿海城市德尔纳的死亡人数已经飙升至11300人。

该救助组织主席玛丽·德雷泽通过电话告诉本社记者,这座地中海城市另有10100人失踪。这场暴雨还造成该国其他地区约170人死亡。10日晚间的洪水暴露出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的脆弱性。自2011年推翻长期执政

的独裁者卡扎菲以来,这个国家一直深陷冲突之中。

【路透社日内瓦9月14日电】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14日说,如果利比亚有一个能够发布警报的正常运转的气象服务机构,那么在袭击该国的洪水中,伤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在日内瓦对记者说,在应对造成数千人死亡的洪灾后果时,利比亚的主要挑战是执政当局“没有正常运转”。

他说:“如果他们正常运转的气象服务机构,原本是可以发布警报的。应急管理部门本来可以实施疏散。我们本来可以避免大部分人员伤亡。”

自2011年卡扎菲政府被推翻以来,该国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战争时断时续,这种政治分裂加大了救援工作的难度。

得到国际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位于利比亚西部的黎波里,而一个平行政府在东部地区运作,包括被洪水摧毁的德尔纳市。

《奥斯陆协议》签订30年

巴以经历新一轮暴力浪潮

【埃菲社耶路撒冷9月12日电】《奥斯陆协议》签署30年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正经历着新一轮的暴力和激进化高潮。而双方谈判代表均认为,这种情况只会进一步加剧这几十年来关系恶化程度,并导致任何对话或和解的可能性都化为泡影。

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在白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历史性握手,在场的人纷纷起立鼓掌表示赞赏。

实际上,华盛顿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是在挪威城市奥斯陆进行的无数小时秘密谈判的成果。然而,自那天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依然以千为单位计算死亡人数——1万多名巴勒斯坦人

和15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以公里为单位计算隔离墙的长度——加沙边界60多公里,被占领土约旦河西岸边界500多公里;同时还以失败次数为单位计算旨在达成和解的尝试。

2023年已有225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以色列方面的数字为34人丧生,导致今年已成为本世纪初以来最血腥的年份之一。

《奥斯陆协议》的主要起草人约西·贝林在耶路撒冷接受埃菲社采访时承认:“30年前的我无法相信2023年我们仍未与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他还说:“我必须承认,有些情况是我们预料到的,比如双方极端分子的抗议,但我从未想到会发生像现在这样的事情。”他提到的事件

包括:1995年时任总理拉宾被一名犹太右翼分子暗杀、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2000年至2005年)的暴力规模、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不断加深的占领和殖民化,以及当时还处于边缘地位的激进分子不断获得权力。

哈南·阿什拉维是前谈判代表,也是协议签署前后巴勒斯坦领导层的一员。她认为,签署的协议注定要遭遇失败,因为其内容更有利于以色列的利益。

阿什拉维在接受埃菲社采访时还说,“在这30年里,我们经历了一连串的事件,这些事件导致巴勒斯坦人感到自己是和平进程的受害者,并明白了以色列从未打算结束占领和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调查显示 俄人口问题愈发严重

【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8月30日报道】题：俄罗斯未婚人数创纪录

俄罗斯的家庭情况很独特。20年来，我们一直在为捍卫传统的家庭观而战。但是，正如2021年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我国单身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了两人或两人以上家庭的数量！为什么单身人数会不断增加？

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俄罗斯单身人口的比例在过去20年里翻了一番，成为家庭总数中占比最大的部分——41.8%。而在本世纪初——2002年，其占比为22%。

2021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6610万个家庭中有2760万户是单身独居者。而且，所增加的单身

人口首次不是来自老年人，而是来自劳动力人口。

需要提醒的是，最近这次人口普查是在2021年进行的，即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也就是说，目前的情况会更严重。

专家对单身人口增加的解读是：年轻人开始更早、更主动地离开父母；过去20年大力建设住房简化了这一过程；俄罗斯人开始推迟结婚；疫情致使死亡率上升。

但与普遍看法相反，离婚与此无关。根据统计数据，离婚数量相对于婚姻数量在过去几十年或多或少保持着某种稳定。

2021年的人口普查还显示，有孩子的完整家庭在减少，有孩子的单亲家庭在增多。

本世纪初，有孩子的完整家庭占比40%，2021年其占比降至20%。近20年以来，单身母亲的人数增加了6%。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伊戈尔·博格丹诺夫指出，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开始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他说：“据我们调查，单身且没有正式家庭的男性占28%。未婚女性占37%。在这37%的人中，有31%的人有孩子。但主要问题在于单亲母亲。在经济上，这种家庭的收入仅略高于贫困线。也就是说，每人每月1.2万卢布（约合125美元）。我看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人口问题，关乎国家的未来。”

智利纪念阿连德遇难50周年

【法新社圣地亚哥9月12日电】11日是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发动政变50周年的日子。当天的情况鲜明展示了皮诺切特残暴的独裁统治遗产带来的政治分裂。

1973年，美国支持的暴力政变罢黜了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当年，当士兵和坦克开始包围总统府时，阿连德自杀身亡。对这场政变的纪念活动至今仍会激发一些人的强烈情感。

智利左翼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在总统府举办活动，纪念智利历史性的一天，他强调要“没有任何细



微差别地”谴责所有侵犯人权的人。

智利极右翼党派独立民主联盟则发表声明为那场政变辩护，称由于阿连德政治左倾带来的失败，当年

的政变“不可避免”。

墨西哥、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乌拉圭总统出席了在圣地亚哥举行的有感染力的仪式。

除纪念活动以外，抗议

者在城市郊区封路引发了混乱。

1973年的政变暴露了美国秘密干预他国政治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11日说，拜登政府“已经试图真诚表明美国在智利那段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因此近日按照智利政府的要求解密了1973年的文件”。

图片说明 11日，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智利总统博里奇、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和乌拉圭总统波乌（从左至右）出席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纪念仪式。（路透社）

匈外长呼吁欧中增进经济合作

【“今日匈牙利”网站9月14日报道】题：增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至关重要

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彼得周三在香港强调，匈牙利将坚决支持欧洲和中国之间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因为这两个经济体的分离对欧洲而言将是“彻底的打击”，会让它无法提高竞争力。

西雅尔多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分组讨论期间说，欧盟目前状况不佳，面临着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和安全挑战。

西雅尔多强调，欧盟的

竞争力状况正一天天恶化，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欧盟上。

对于有人认为欧洲和中国应在经济上分离的说法，西雅尔多强调，双方每年的贸易额有数千亿欧元，与中国经济分离将让欧洲“彻底出局”，从而“扼杀”欧洲经济。

西雅尔多指出，匈牙利政府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让匈牙利成为东西方企业的交汇点，从而确保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匈牙利奉行基于互联互通的外交政策，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成功的，

因为匈牙利已经成为中国在中欧投资的头号目的地，也是欧盟国家中率先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他还解释说，欧洲企业与匈牙利的立场相似，也强烈反对脱离与中国的经济接触，认为如果没有东西方的密切合作，欧洲大陆就无法重新获得竞争力。

他总结说：“匈牙利人相信互联互通，相信东西方合作，强化‘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会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重点，因为我们从中获益匪浅。”

外电述评 马杜罗称赞深圳发展成就

【拉美社加拉加斯9月9日电】据当地媒体9日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中国访问期间参观了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并对展览予以高度评价。

另据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报道，马杜罗与在场者分享了他在展览留言簿上写下的信息。

“我们度过了特别的一天，”他写道，“了解了深圳的成功经验。谨在此留下我们的问候和承诺。愿我们的友谊长存！”

马杜罗今天继续访华行程。此次访问的第一站是南方城市深圳，这是中国的主要科技和工业中心之一。

马杜罗在社交媒体上就他

在深圳人才公园受到的欢迎，以及灯光和无人机表演表示感谢。

他补充道：“我确信我们两国的关系将继续走在发展和繁荣的道路上。”

【埃菲社加拉加斯9月9日电】委内瑞拉政府9日表示，在马杜罗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委内瑞拉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关于经济特区合作、发展和现代化的合作备忘录。

相关公告介绍说，该备忘录是由委内瑞拉国家经济特区管理局与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签署的。

公告解释说，该备忘录的

签署是在马杜罗参访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期间进行的。委内瑞拉总统在此参观了广东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

马杜罗在社交媒体上指出，商定的合作将为两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另一条消息中，马杜罗称他对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访问是“成功的”，并宣布自己已抵达上海。

马杜罗于8日抵达中国，这是他自2018年以来首次访华。

在深圳，马杜罗与当地官员讨论了经济特区的落实等话题。他在谈到“21世纪的发展”时称，经济特区“至关重要”。

学者文章 智利政变50周年，“门罗主义”幽灵未散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9月11日文章】题：智利政变50年后，拉美地区仍未摆脱美国的干预（作者 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荣誉教授约翰·柯克 加拿大国王学院大学新闻系教授斯蒂芬·金伯）

今天是智利军事政变50周年纪念日，那场政变给拉丁美洲历史上带来最残暴的独裁统治之一。

1973年9月11日，由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政府推翻了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政府。美国尼克松政府为这场政变提供了鼓励与支持。

煽动政变公然入侵

自从1823年12月美国时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宣布在西半球建立一个保护领地（即著名的“门罗主义”）以来，美国一直在干预拉美各国事务，追求自身利益，但始终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幌子。1973年的智利政变就是这样一次干预行动。

多年来，一些解密后公开的官方文件和电话录音揭示了1970年9月阿连德在大选中险胜后，华盛顿是如何竭力让阿连德下台的。

根据当时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的笔记，在阿连德获胜后一周左右，尼克松给赫尔姆斯下达了“让智利经济痛苦尖叫”的命令，以阻止阿连德上台或是推翻他。而在那之前，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打给赫尔姆斯的电话中已经确认了美国政府推翻阿连德的意图，并表示“我们不会在智利前功尽弃”。

到了1973年9月16日，也就是皮诺切特发动血腥政变后几天，尼克松致电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询问美国作为此次政变的“幕后黑手”会不

会暴露。根据解密的通话记录，基辛格承认“我们帮助他们”。

成功煽动政变推翻智利民选领导人后，美国并没有结束对智利事务的破坏性干预。

在皮诺切特统治的第三年，也就是1976年6月，基辛格亲自访问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重申华盛顿对他的支持。

根据解密的对话记录，基辛格对皮诺切特说：“如你所知，在美国，我们对你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是持同情态度的。我们想要帮助你，而不是拆你的台。你推翻阿连德的举动为西方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也许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最具破坏性的干预行动之一，但它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开始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之前，美国1954年已经在危地马拉策划了推翻哈科沃·阿文斯·古斯曼民选政府的政变；1965年美国公然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它多次企图暗杀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成功扶植皮诺切特政府后，美国继续为拉美地区众多独裁者的军队提供军事训练，还出兵2.4万人入侵巴拿马以废黜其实际统治者。

干预行径延续至今

遗憾的是，美国控制其“后院”的努力延续至今。

华盛顿仍在给美洲人民带来难以估量的苦难，以确保他们在被统治的过程中无法挑战美国的利益。美国仍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希望借此导致经济困境从而触发政变。美国还没收了委内瑞拉数百亿美元的财产，并通过制裁使委内瑞拉经济陷

入困境，从而导致该国政府的垮台，但对其人民的苦难却毫不关心。美国还指责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为“暴政三国”。

现在，对于那场罢黜了阿连德并为皮诺切特铺平道路的政变，谴责起来既讨喜又轻松。毫无疑问，在政变发生50周年之际，也会有人提到在智利人民遭受痛苦的一系列事件中美国所扮演的角色。然而，过去50年间，美国对待其“后院”的态度几乎从未改变，有关这一点，却没有充分的讨论。

在帮助皮诺切特夺取智利政权后，华盛顿继续奉行门罗主义，即美国在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干预西半球国家的事务。

奥巴马是第一位公开反对干预政策的美国总统。他的国务卿约翰·克里曾在2013年11月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然而，仅仅五年后，在美国针对古巴、委内瑞拉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政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迈阿密对参加猪湾行动的老兵们表示，门罗主义复活了。

拜登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副总统时，曾对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表现出浓厚兴趣，他目前似乎再次埋葬了门罗主义。

然而，当我们回顾50年前智利的悲剧事件、回顾美国以保护“后院”之名进行的诸多干预所带来的严重人道主义后果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尼克松和特朗普所说的门罗主义在华盛顿仍然有无数支持者。

在阿连德去世50周年，也是门罗主义首次提出200周年之际，美国干预的威胁仍然笼罩拉丁美洲。

美媒
述评

法扮演“非洲宪兵”时代走向终结

● 新闻焦点

【美联社达喀尔9月4日电】题：法国在受政变冲击的非洲国家影响力明显减弱，而没有人怀念前殖民者

当加蓬长期执政的领导人上周在非洲最近的一次政变中被拘押时，法国谴责了这次行动，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尽管它在加蓬有数百人的驻军。这是法国与过去历史的一次惊人的决裂。

非洲和法国观察人士表示，法国在压力下终于放弃了“法属非洲”的后殖民主义传统。法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正在衰落，而日益自信的非洲将目光投向了别处。

在近几十年来对其前殖民地反复进行军事干预之后，法国作为“非洲宪兵”的时代可能终于结束了。

“在过去的‘法属非洲’时代，这场政变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很快被扭转。”美国前驻非洲萨赫勒地区特使彼得·法姆在谈到法国对加蓬政变的“沉默回应”时表示，“法国的不作为甚至比7月的尼日尔政变时更凸显出时代已经变了——加蓬长期以来一直是旧式的后殖民体系的中心。”

过去三年里，四个非洲国家发生的政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加蓬等国仍与法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在其他国家出现了新的反法情绪。俄罗斯准军事组织瓦格纳集团与中非共和国等地的政界人士交往。中国在非洲的经济



3日，尼日尔军政府的支持者在首都尼亚美的法国军事基地外举行集会，要求法国从尼日尔撤军。(法新社)

影响力已经超越法国。一些前法国殖民地正在加入英联邦。非殖民化后的几十年里，法国继续对非洲进行幕后操纵并获取利益。有时，严厉的影响会引发反对，但法国支持的领导人往往会重新掌权。

这些努力现在正在倒退。由于2020年马里政变后与军政府关系持续紧张，马克龙去年从马里撤出了法国军队，最近又出于类似原因从布基纳法索撤军。这两个非洲国家都要求法国军队离开。法

国还暂停了在中非共和国的军事行动。

马克龙是第一位在殖民时代结束后出生的法国总统，他明确表示法国已经翻过了后殖民时代干预主义的一页。尽管他一直在非洲高喊“伙伴关系”，一些不愉快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

来自尼日尔的国际问题研究员塞义迪克·阿巴表示，法国有点忽视了非洲已经发生的变化，而巴黎对非洲来说并不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他说：“前法国殖

民地正在从其他地方寻找自身利益，他们并不会只盯着与法国的过往。”

谴责法国对非实施后殖民主义政策的非政府组织“生存”组织的发言人博雷尔说：“谈论结束‘法属非洲’是很有吸引力的。‘法属非洲’的特点是一系列制度——法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非洲、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以及法国的家长式文化，包括法语国家组织峰会。”

如今，法国在六个非洲国家保留了超过5500名军人。尽管尼日尔发生政变，但法国仍在尼保留了军队，而军政府撤销了法国大使的外交豁免权。在邻国马里，许多人对法军的存在感到不满，因为法国未能清除该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分子。

情绪的变化反映出简单的事实：今天，绝大多数非洲人都很年轻，没在法国统治下生活过。也许非洲最显著的变化是文化上的，法国根本就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提供愿景了。出生于吉布提的60岁诗人谢希姆·瓦塔今年对法媒说，多年来，法国资金和军事存在的缩减，以及签证限制的收紧，“损害了”法国的形象。

在科特迪瓦，大学生洛朗·瓦萨表示，他不再想去法国学习，因为他认为自己将接受的教育质量已经下降。

记者安托万·格拉泽表示，非洲人将决定与法国关系的变化。“并不是法国总统会下令结束‘法属非洲’，那是没有用的，”他说，“而是非洲将纠正法国的家长作风，并获得新的视角。”

【日本《朝日新闻》8月17日报道】题：揭秘傀儡国家的黑钱来源

在曾是“满洲国”首都“新京”的吉林省长春市的古玩市场，一名店主展示一个金属托盘，乍一看很旧，但中间雕有精美的花卉图案。

“鸦片是富人的消遣。他们甚至对烟斗和放灯的托盘都很挑剔。”该店主说。

在那段时期，尽管政府表面禁止鸦片，但只要登记就能买到，所以鸦片广泛渗入到民众中。

这名古玩店主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长春，他听父亲说，当时长春满大街都是鸦片馆，和茶馆一样多，拉车的车夫休息时也会进店吸几口，大家对此习以为常。

关东军最基本资金来源

长春市内至今还有先前“统治者”留下的痕迹，那就是位于市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

关东军是为了保护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和辽东半岛南部（关东州）而设立的军队。不过，它脱离了日本陆军中枢的控制，1931年在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炸毁满铁铁路，称此为中国方面所为，并以此为借口扩大对华军事行动，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

在“柳条湖事件”发生后的1932年，关东军扶植成立了“满洲国”。

日媒揭秘 侵华日军大肆贩卖鸦片“以毒养战”

“‘满洲国’是关东军筹集军费的巨大机器”，这是部分近现代史研究者的共识。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山室信一指出，旧日本陆军之所以能在亚洲开展大范围军事活动，主要是依靠从“满洲国”吸收的资金，而鸦片是其最基本的资金来源。

日本通过贩卖鸦片赚取巨额利润。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些利润有部分流向关东军。之所以能如此，根本在于“满洲国”政府对鸦片实施垄断专卖制度。

已故的历史学家山田豪一在《满洲国的鸦片专卖》一书中指出，在关东军占领的奉天（沈阳），很多日本人经营的商店转为贩卖鸦片的“烟馆”。

“满洲国”垄断鸦片主要是想囤积黑市，目的是赚取财政收入。这一点可通过相关资料加以证明。

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件”发生后，关东军次日占领奉天市主要部分，开始临时掌管市政。

根据关东军参谋部20日制订的“市政实施计划”，奉天市的收入除了当地军阀政权的收入，还包括和贩卖鸦片有关的收入。当时，仅奉天市一年的收入目标就高达36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的41亿多日元（100日元约合4.97元人民币——本报注）。

控制占领区毒品交易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使中日陷入全面战争。日本将“满洲国”的鸦片营利机制扩展至更广阔的中国战场。

1938年3月，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陷入困境，日本在南京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次年4月，该政权仿效“满洲国”，颁布了只允许登记在案的成瘾者吸食鸦片的制度。

同一时期，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成立了负责鸦片流通的“华中宏济善堂”，由被称为“上海鸦片王”的日本人里见甫掌权。该组织表面上听从维新政府的指挥，实际上由日本内阁直属机构“兴亚院”管理。

里见甫曾是在中国的日语新闻记者，“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本报注）时负责关东军的宣传工作，他之所以涉足鸦片流通，主要是因为受到陆军参谋本部的邀请。

2008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中有一份旧资料被发现，这是里见甫向日本政权中枢介绍“华中宏济善堂”工作概况的机密文件。

其中写道，成立“华中宏济善堂”的目的是使鸦片流通处于日本的掌控之下。在上海活动的日军特务机构将创建

鸦片销售组织的任务交给里见甫。

鸦片供应地起初是中东，后来换成内蒙古，日军曾在那里扶植起傀儡“蒙疆政权”。还有资料显示，“华中宏济善堂”也应“满洲国”政府要求，经营热河地区生产的鸦片。

之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尽管作为证人出庭的里见甫否认交易的存在，但相关资料中明确记录了吗啡等毒品的库存。这些吗啡也是由“满洲国”制造的。

据称，鸦片和其他毒品交易的结算均由“兴亚院”和大藏省完成。1941年度的交易额约为1.55亿日元，约合现在的600亿日元。

根据战后的研究，1942年，上海“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基础，提出“大鸦片政策”。该机构欲将蒙疆产的鸦片流通至东南亚等地，而“华中宏济善堂”正是流通中枢。

不过，该计划因日本战败而不了了之。1945年7月，关东军命令“满洲国”政府交出存于“新京”周边的所有鸦片。

当年8月9日，苏联攻入“满洲国”，溃败而逃的关东军打算运走鸦片，但被附近居民一抢而空。“鸦片国”也随着日本战败而彻底崩溃。

贩卖鸦片最大的获益者是日军，而受害者是贫苦百姓。

伊莎白·柯鲁克：

百年人生，每一次选择都是中国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月25日文章】题：108岁的伊莎白·柯鲁克去世；她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迁（作者 克莱·里森）

出生于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伊莎白·柯鲁克8月20日在北京逝世。伊莎白是中国最著名的外国居民之一，作为教育家、人类学家和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拥护者而备受爱戴。

记录中国社会变革

伊莎白1915年12月15日出生在四川省省会成都。她的父母霍默和缪丽尔·布朗是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伊莎白是最后一代在中国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西方人之一。经验定义了她们。包括伊莎白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将这个国家从殖民的悲惨中解救出来。

作为人类学家，伊莎白认为自己是社会变革的观察者；作为共产主义者，她认为自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员。

1938年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回到中国后，她在四川西部贫困、偏僻的村庄进行实地工作，徒步、乘骡车甚至滑索穿越峡谷和山口。

她在中国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戴维·柯鲁克。



伊莎白·柯鲁克(新华社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们搬到了英国。在那里，戴维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伊莎白在一家军工厂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在1942年结婚。

柯鲁克夫妇在1947年回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乡镇教英语。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进入北平时，他们是陪同队伍中为数不多的西方人。

这对夫妇是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创始教师，在那里，他们帮助培养了几代中国外交官。

他们根据自身在中国农村度过的岁月共同撰写了两本书：《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1959年）和《阳邑公社的头几年》（1966年）。

这两本书都已成为中国民族志领域的经典之作，因为这两本书都分析了共产主义革命等世界历史变化是如何影响农村的日常生活的。

与其他西方人不同，柯鲁克夫妇选择住在校园里，与他们的学生和同事在一起。他们像他们的邻居那样，穿着简单的麻布衣服。没有人管柯鲁克夫人叫“教授”，她永远都是“伊莎白同志”。

伊莎白最近的一本书《兴隆场（1940-1941）：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抗》，也是她最重要的一本书，出版于2013年。该书基于她战前的实地考察记录，由她与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合著。

该书的编辑之一、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贺萧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看待农村社会的独特视角。

贺萧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伊莎白毕生都对大城市以外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超越了历史学家和保存文字记录的人的视野。她有很好的直觉，知道什么是有趣的事物，什么是日常生活中真正值得写下来的事情。”

西方与中国的桥梁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8月

26日报道】题：人类学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记录者伊莎白·柯鲁克逝世

“在过去100年里，我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和多次群众运动。”伊莎白·柯鲁克曾这样写道。她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观察——以及参与——现代中国的诞生。

伊莎白是在华加拿大卫理公会传教士的女儿，她曾通过描述中国乡间村民的生活记录了国民党政权的衰落和共产党的崛起。这位作家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罕见桥梁。

柯鲁克1915年生于中国西南省份四川的省会成都。她在该市的基督教学校完成了中小学教育，随后前往多伦多大学学习。

1938年毕业后，她立即回到中国西南地区，在重庆市附近一个村庄展开研究。重庆市是日本入侵后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在那里，她对1500户家庭进行了研究，作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资助的乡村重建计划的一部分。

她在报告中写道，“盗匪活动猖獗”，并描述了自己和合作者俞锡玑如何带着吓退护家犬的棍子前去家访。但是，作为20岁出头的年轻女性，她们被认为是没有威胁的人，并且最终

受到村民的欢迎。

伊莎白记录了乡村生活的一个个隐秘瞬间，从民众对政府改革婚姻和使离婚合法化的尝试的反应，到他们逃避兵役的努力。伊莎白后来把她们的观察结集出版，书名为《兴隆场（1940-1941）：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抗》。

在成都时，伊莎白结识了英国共产党员戴维·柯鲁克。他被他的政治倾向所鼓舞，而他则被她的冒险精神所折服。两人去了伦敦，并于1942年在那里结婚。不久后，伊莎白加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

柯鲁克夫妇后来又回到中国，以记述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的土地的情况。按照伊莎白自己的说法，这是她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参与者兼观察者角色的开始。

1949年10月1日，柯鲁克夫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们在首都定居了下来，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伊莎白在那里一直待到退休。戴维在2000年去世，享年90岁。

2019年，伊莎白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这是中国国家级别的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来源：《参考消息》